

第一章 行整风反右倾 柳暗花又明

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但是，这并不是说在我们的社会里已经没有任何的矛盾了。^①

——毛泽东

1956年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国家的主要注意力由社会主义改造转向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在这历史的关头，中国人民面临的最大课题，是如何寻找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建设道路，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然而，在中国这样落后的大国中建设社会主义，是世界上仅有的。我们既不能照搬外国，又不能照抄书本，必须像民主革命时期寻求中国革命道路那样，根据中国国情，探索出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

1956年，国际国内出现了一系列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这些新情况和新问题促使中国共产党开始探索适合自己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

^①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第31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1月版。

1953 年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党和国家高层领导经过复杂的内部斗争，最后由赫鲁晓夫掌握了领导权。经过赫鲁晓夫的周密筹划，苏共于 1956 年 2 月 14 日至 25 日召开了第二十次代表大会。55 个外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应邀出席这次大会。

这次大会总结了国际关系和苏联国内建设的新经验，做出了关于坚定地执行列宁的社会制度不同的各国可以和平共处的政策、发展苏维埃的民主制度、贯彻遵守党的集体领导原则、批判党内的缺点、制定发展国民经济的第六个五年计划等一系列决定。

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在大会中占有重要地位。大会非常尖锐地揭露了个人崇拜的盛行在过去较长一段时期内给苏联造成的不良的后果。

在 2 月 14 日的大会上，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代表苏共中央委员会做了总结报告。经过多次讨论，大会就这个报告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大会闭幕后，2 月 24 日夜 11 点半，参加这次大会的代表们被通知回到克里姆林宫去听报告。根据苏共二十大主席团的决定，赫鲁晓夫从 24 日午夜起到 25 日凌晨，做了大约四个半小时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报告会未邀请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团参加。

会后不久，苏共中央将这个报告分送给各兄弟党，并在苏共党内外进行了普遍的宣传，使这一报告家喻户晓。

报告会召开的第二天，国外就知道了这个报告的要点并在非共产党的刊物上将其发表。

几个星期以后，美国国务院用英文发布了报告的全文。该报告传遍了全世界。

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错误进行

了批判。

苏共二十大以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幸灾乐祸。他们把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看做是“空前未有的合乎我们目的”的举动，叫嚷要利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为武器来摧毁共产党运动的威望和影响。于是他们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次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逆流，大肆攻击苏维埃制度，攻击社会主义阵营，攻击各国共产党，使许多兄弟党、兄弟国家处于严重困难的境地。

时任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断言：“苏联共产党结构正处于恶化状态，而统治者的权力正在崩溃，……面对着这种形势，自由国家必须保持道义的压力，这种压力有助于破坏苏联—中国共产主义体系。”

他鼓吹北大西洋公约之内的国家“搞垮以军国主义和无神论观念为基础的苏联强有力的专制政治”，并且认为“改变共产党世界的性质，在现在看来似乎是可能的事情”！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在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也引起了极大的思想混乱。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中，一些不坚定的分子纷纷退党。

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由于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错误和这些国家照搬苏联模式，片面发展重工业，不注意发展农业、轻工业以解决人民的生活问题，在人民群众中早已酝酿着不满情绪。

在苏共二十大及批判斯大林的影响下，这种矛盾和不满情绪急剧发展起来，导致了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十月事件的发生。

波兹南是波兰西部的工业城市。该市采尔盖斯基工厂曾派工人代表团就工人收入下降、工厂开工不足、劳保和附加工资不能按时发放等问题向当地政府申诉，遭到拒绝。

6月28日，工人走上街头进行和平示威，参加者有一万六千余人，其中党员四千余人。后来由于反动分子讹传去华沙告的工人代表团被捕，工人更为激愤，高喊“要面包和自由”、“俄国佬滚回去”、“打倒秘密警察”等口号，并与警察发生了冲突，继而袭击了波兹南市人民会议和波兰统一工人党市委及军事检署、监狱、电台等机关。波兰政府出动了保安部队和坦克平息了骚乱。在武装冲突中双方死亡³⁴人，伤二百多人，三百多人被捕。

对于波兹南事件，苏联认为是美国策划的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反人民暴动”，与波兰党看法相异。

7月18日，波兰党召开七中全会，通过《关于政治、经济局势和党的主要任务》的决议，承认波兹南事件是“由于经济的疏忽”，指出党的工作中严重存在着“个人迷信、官僚主义堕落和党内缺乏民主”。

决议决定从改善人民生活、实行经济合理化和政治民主化着手采取措施，以缓和人民群众中的不满情绪。

10月19日，波兰党召开八中全会，赫鲁晓夫未经邀请而赴会干涉波兰党领导人选安排，并出兵华沙。波兰党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并改选了中央政治局，哥穆尔卡出任第一书记。他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了调整，局势得到稳定。

苏共二十大以后，匈牙利人民要求扩大民主，进一步改善生活，在平等基础上调整匈牙利同苏联的关系。

以拉科西为首的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和政府对人民群众这些广泛的呼声和迫切要求采取了官僚主义的态度，在纠正错误的工作上表现得迟疑和缓慢，因而激起了群众的不满。

10月22日，首都布达佩斯各大专院校学生团体在波兰事

件的影响下召开会议，要求摆脱苏联控制，建立平等的苏匈关系；要求政府给人民以民主自由，重新选举党的领导人；要求改变苏联模式，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改善人民生活。

10月23日，学生们上街游行，喊了一些要民主、要纳吉上台、要求苏联驻军滚回去等口号。参加游行示威者达20万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第一书记格罗发表广播讲话，指责群众“反苏”。这就增加了人民群众与党和政府的对立情绪。群众自发成立了工人委员会、革命委员会一类的组织，占领了军事仓库、电话交换台、电台和报社等重要机关，政府已无法控制局势，出现了无政府状态。

为了平息群众反政府的动乱，匈牙利党中央决定改组领导机关，由纳吉出任政府总理，由卡达尔出任党的第一书记，免去格罗的职务。但动乱并未因此停止，并有扩展之势。西方帝国主义间谍和反革命分子乘机混入群众中，煽风点火，制造混乱，使局势更加复杂化。从10月30日起，匈牙利事件开始误入歧途，向错误的方向发展，许多共产党人被杀害。

11月4日，苏联出兵匈牙利，镇压了骚乱。在苏联支持下，成立了以卡达尔为总理的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也改名为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并组成了以卡达尔为首的临时中央委员会，整顿和重建了党的组织。在几个星期的动乱中，工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国民经济受到巨大损失。

波匈事件，一方面是国内外反动势力煽动的结果；另一方面，它是对党、国家与工人阶级之间的不正常关系，对官僚主义、个人迷信、全盘苏化方针进行抗议的表现；也是苏联大国沙文主义错误干涉的结果。

哥穆尔卡在波党八中全会上说：“波兹南工人走上大街，抗议的不是人民波兰，不是社会主义，他们抗议的是在我们社会

制度中广泛蔓延的，并使他们感到切肤之痛的弊病，抗议的是对于所理想的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歪曲。”

上述情况说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突出，即使有国际国内反动势力煽动、插手的因素，也是利用了人民内部矛盾。

中共中央认为，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是不对的。毛泽东在会见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时多次指出：斯大林在执政期间的根本方针和路线是正确的，功大于过；对斯大林要具体分析，要全面评价；全盘否定斯大林我们是不同意的。

同时，中共中央认为苏共二十大在破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揭露其错误的严重性方面具有积极意义。

从斯大林错误的严重性，可以进一步看出苏联模式的缺点，诸如政治生活方面缺乏社会主义民主，肃反扩大化，个人迷信严重，大国沙文主义，指挥控制别国别党的老子作风等；在经济建设方面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轻工业，片面扩大积累，忽视群众生活，经济管理体制集中过多过死等。

因此，中共中央一方面采取维护斯大林的立场，另一方面又开始以苏联的错误为鉴戒，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针对苏共二十大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人民日报》于4月5日和12月29日先后发表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写成的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这两篇文章在驳斥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攻击的同时，论述了怎样历史地、有分析地看待无产阶级专政下所犯的错误问题，指出了斯大林在内外政策方面所犯的一些严重错误和产生错误的原因以及如何从中吸

取教训的问题，指出斯大林所犯的错误是马克思主义者工作中的是非问题，不是敌我问题。

《再论》第一次提出了两类社会矛盾的问题，指出：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而且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获得解决，从而在新的条件下得到新的团结。对斯大林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是混淆人民内部的是非和敌我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客观上帮助了敌人。

这两篇文章还论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经验，肯定了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义。

除上述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外，我国国内形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1956年，我国不仅提前完成了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面貌，而且提前完成了三大改造。我国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阶级结构、经济成分、社会主要矛盾和任务都发生了重大改变。国内的主要敌人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早已消灭，反革命分子的主要力量也基本肃清；富农阶级正在消灭之中，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也处于最后消灭的过程，这个阶级的成员正处在由剥削者到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农民和个体手工业者基本已变成社会主义集体劳动者。

这些情况表明，阶级斗争的急风暴雨时期已经过去，敌我矛盾已基本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逐步突出并发展成为主要矛盾。

当时，人民内部矛盾成为我国政治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的矛盾不是偶然的。

首先，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起来，某些环节还不够完善，需要有一个继续健全、巩固的过程；广大干部还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需要有一个提

高认识、学习和取得经验的过程；人民群众对新社会制度需要有一个熟悉和习惯的过程；民族资产阶级分子要有一个适应新社会需要和帮助他们适应新社会需要的过程。

其次，在 1956 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了一些过急的缺点错误。在改造方面，将一部分小资产者当做资本家对待，使这些人家庭负担较重，对实行公私合营发生了动摇。有些农业社存在着平均主义，农具折价过低，损害了中农利益；经营管理和收支账目比较混乱，群众不放心。有些手工业合作社采取了先积累后工资福利的政策，社员收入下降。在建设方面，由于基建投资过多，财政出现了赤字，不仅生产资料紧张，生活资料也紧张，人民日常生活用品供应不足，因而引起部分群众不满。

再次，一部分干部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他们对群众疾苦漠不关心、高高在上，对群众提出的合理要求不设法解决，对群众提出的不合理要求也不进行说服教育。

此外，苏共中央批判斯大林和波匈事件对我国也有影响，有些人看到波兰和匈牙利工人、学生搞大民主，也想在中国搞大民主，以为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在国内国际因素的影响下，从 1956 年下半年到 1957 年春，一些城市和农村先后发生了少数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民闹退社的事件，还有人进京上访告状。群众闹事有增无减。

据统计，在 1956 年一年中，仅全国总工会收到的报告和直接处理的罢工、请愿事件就有 86 起。从 1956 的 8 月底到次年 1 月的近半年时间内，全国各地大小有一万多工人罢工，一万多学生罢课，还有几十个县的农民闹事。到 1957 年上半年，闹事的数量和规模较 1956 年下半年有了新的增加和扩大，成为当时新出现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

这些事件的性质多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坏人捣乱破坏是个别的。

从学生罢课看，绝大多数是由于对学校某些安排不满、教育质量低、教学设备不足、经济生活条件差和对毕业分配有意见而引起的。

从工人罢工看，直接或间接同工人切身利益有关的占了绝大多数。

从农民闹事看，多数是由于农业合作化后出现的问题得不到解决而引起的。综观这些闹事，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的需要与可能、目前利益与长远利益、正确与错误之间的矛盾，而不是对抗性的矛盾。

对于这些新情况和新问题，许多干部和党员缺乏正确的认识。他们误以为社会主义既然消灭了剥削阶级，就不存在什么矛盾了。对于群众闹事缺乏思想准备，群众一旦闹起事来，或者惊慌失措，陷于被动，感到无法理解；或者用阶级斗争的老眼光来观察所出现的问题，采取简单粗暴的办法进行压制，以致矛盾更加激化。

兰州环上学校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这个学校于 1956 年筹建，设备简陋，困难很多，学生入学后情绪一直不稳定。

寒假前，学生要求发回家路费，没有引起校方重视，未采取措施加以解决。学生随即宣布罢课，向省人民委员会请愿。有关部门竟然组织了军警和干部四五百人到校“围楼”，喊叫“坚决镇压坏分子！”并逮捕了九个学生。接着召开批判会、斗争会和全校性的控诉大会，把这些学生斥为反党反人民的坏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有关部门还准备将参与闹事的学生分别按法办、劳动教养、开除和勒令退学等论处。

国际、国内风波迭起，提出了一系列带根本性质的问题：社会主义社会还有没有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有什么特点？怎样正确对待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什么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弄清这些问题，关系着无产阶级国家的兴衰存亡，是我党当时所面临的重大课题。

从 1956 年春到 1957 年春，党中央和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矛盾开始进行系统的探索和深入分析。

1956 年 4 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斯大林的错误问题时，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批判了一些天真浪漫的想法，肯定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指出：“否认矛盾存在，就是否认辩证法。各个社会的矛盾性质不同，解决矛盾的方式不同，但是社会的发展总是在不断的矛盾中进行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也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进行着的。”

4 月 25 日，毛泽东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毛泽东以苏联经验为鉴戒，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伟大任务。

在讲话中，毛泽东论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这十大关系就是十大矛盾，其中大部分是人民内部矛盾，一部分是敌我矛盾。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以便把党内外、国内外的一切积极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9 月，中共八大正确分析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的变化。

大会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的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明确指出：虽然我们还必须为解放台湾、为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为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和最后消灭剥削制度而斗争，但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基本结束，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基本建立起来，革命的急风暴雨时期已经过去。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满足人民的经济文化需要。虽然还有阶级斗争，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其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这实际上是指出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

11月，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召开。刘少奇做了《目前时局问题的报告》，他着重介绍了波、匈事件的经过，分析了事件发生的原因，以及党对这些问题所采取的政策和应得的教训。他指出：波、匈事件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官僚主义问题，国家领导人员有许多特权，严重脱离劳动人民群众。我们要加强人民对领导人员的监督，干部要严格遵守党和国家的纪律，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

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讲话，在总结波、匈事件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

他指出：世界充满着矛盾。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

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矛盾是不断出现的，将来全世界的帝国主义都打倒了，阶级消灭了……那个时候还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矛盾。在他的讲话中，也有“左”的错误观点，如他强调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并赞成搞大民主。

12月4日，毛泽东在《给黄炎培》的信中提出了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科学概括。他指出：“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①他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有两种矛盾，一种是敌我之间的，一种是人民内部的。前者要用镇压的方法，后者要用说服的方法。

12月下旬，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再次讨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进一步提出了两类社会矛盾的问题，指出：在我们面前有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第一种是敌我之间的矛盾，这是根本的矛盾，它的基础是敌对阶级之间的利害冲突。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非根本的矛盾，它的发生不是由于阶级利害的根本冲突，而是由于正确意见和错误意见的矛盾，或者由于局部性质的利害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而且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获得解决，从而在新的条件下得到新的团结。

1957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

毛泽东在会议上做了重要讲话，着重分析了一年来的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党内外的思想动向。

^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第25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1月版。

他认为，1956 年是多事的一年，有些地方学生闹事，一些教授也有各种怪论，党内少数人动摇。但是，大多数干部是正常的，共产党的农村和城市政策是正确的，全国大乱子闹不起来。

他指出，对大民主，第一不怕，第二要加以分析。闹事的原因有些是由于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在政策上犯了错误；有些是工作方法不对；也有些是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存在及其破坏。对于闹事，要分清情况处理，闹得对的我们应当承认错误，并且改正；闹得不对的，要驳回去；有对有不对的，对的部分接受，不对的部分加以批评。

毛泽东指出：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就我国的情况来看，现在的社会矛盾，一部分是敌我矛盾，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

由上可见，苏共二十大以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在探索社会矛盾的过程中，提出了许多重要观点和深刻的见解，从而为形成两类矛盾的理论体系奠定了基础。

1957 年 2 月 27 日至 3 月 1 日，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在京召开。

毛泽东做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提到社会主义社会充满着矛盾，社会主义社会要在揭露和解决矛盾中前进，提出了两类不同性质社会矛盾的学说，规定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系列重要方针和方法。

讲话的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明确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特点。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研究社会主义社会，肯定社会主义社会是充满了矛盾的，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社会的前进。他指

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它们之间既有基本适应的一面，又有不适应的一面。但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根本不同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这些论述，为探索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指明了方向。

（二）提出了两类社会矛盾的理论。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分为两类，一类是敌我矛盾，一类是人民内部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一般说来，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办法也不同。简言之，解决敌我之间的矛盾，用专政的方法，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是采用民主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毛泽东提醒大家，要十分注意并且善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他说：“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

（三）明确了大规模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后人民内部矛盾已成为政治生活中的主题。毛泽东根据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社会矛盾和阶级关系的变化，指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也就是说，工作重心应该转移到经济建设上面来。

毛泽东说：“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

类矛盾的界线，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了。”这就明确指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已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四）制定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强调要普遍推行 1942 年整风时提出的“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同时还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方针：在经济工作中要统筹安排和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正确处理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在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上要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科学文化中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民族关系上要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关系；在肃反问题上，坚持“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对少数人闹事问题，决不可镇压，要特别注意克服官僚主义，也要对群众进行教育和引导。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具有重大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般地论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的发展动力。限于历史条件，他们没有具体论述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发展动力问题。

列宁曾预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但没有来得及充分阐述。斯大林在较长时期否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直至晚年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矛盾，弄不好，还会发生冲突。但没有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发展动力提出来。

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深入研究了国际国内

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经验，肯定了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矛盾，指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特点，明确提出了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并规定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这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一大贡献。讲话坚持和发展了“八大”提出的正确路线，进一步阐明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方针，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是我国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方面取得的重大成果。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公开正式发表时，反右派斗争已经开始。由于毛泽东对当时少数右派分子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的形势做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因此，他在整理讲话稿的过程中，加进了一些观点和内容。在讲了“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之后，又说：“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这些观点给后来的阶级斗争扩大化以极大的影响。但是发表稿保持了原讲演稿的基本精神，并增补了一些重要内容，加强了一些理论分析，使一些问题的论述更为系统，更加透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主题这一中心思想仍然贯穿全篇，这才是这篇文章的主要价值，也是它所以值得充分肯定并对今后具有指导意义的主要根据。

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后，中共中央于 1957 年 2、3 月间几次发出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进行传达和讨论。党内外各级干部和知识分子遵照中央指示认真学习讲话，并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总结和检查工作，倾听党内外群众意见，分析和研究人民内部矛盾的各种表现，努力调整社会主义内部关系的各种问题。

为了加强党的政治教育和思想工作，1957 年 3 月 6 日至 13 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宣传工作会议，除中央和省（市、自治区）两级宣传、文教等部门负责同志参加外，还广泛吸收科教、文艺、新闻出版单位的党外人士一百多人参加。会上，传达和讨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3 月 12 日，毛泽东做了重要讲话，就大家所讨论的问题讲了八点意见，其中着重讲了知识分子问题、整风问题和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问题，强调要继续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

毛泽东分析了我国知识分子的情况。他认为，从政治态度看，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都是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对于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大约只占总数的 1% 到 3%。从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看，赞成而且比较熟悉的占少数；反对的也占少数；多数人是赞成但不熟悉，赞成的程度又很不相同。这里有三种立场，即坚定的、动摇的和反对的。

毛泽东论述了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指出：知识分子是教育者，是当先生的，就有一个先受教育的任务。知识分子如果不把自己头脑里错误的东西去掉，就不能担负起教育别人的任务。要做好先生，首先要做好学生。毛泽东指出知识分子必须